

郑玄《春秋》学考述

赵 伯 雄

郑玄是东汉的大儒。他学贯今古，遍注群经，为一代学者所宗仰。清代汉学复兴，郑玄更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。但前人对于郑玄的研究，多集中在他的《礼》学及《诗经》学，有时也谈到他注的《论语》、《周易》及《尚书》，而对于他的《春秋》学，则很少有人涉及。本文打算在这一方面做些探索，试图勾勒出郑玄《春秋》学的基本面貌。

郑玄的经学，基本上是古文家的路数，以训诂名物为主要的內容。他除了注释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等书之外，对于《春秋》，也有深入的研究。不过，他可能对《春秋》经传不曾写过任何一部完整的注。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云：

“郑玄欲注《春秋传》，尚未成时，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，先未相识。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已注《传》意。玄听之良久，多与己同。玄就车与语曰：‘吾久欲注，尚未了。听君向言，多与吾同。今当尽以所注与君。’遂为服氏注。”

按此说清代学者多以为可信。看来郑玄确曾打算作《左传注》，而且也已作了一部分，但后来把所作都给了服虔。因此服虔的《左传注》中是包含有一部分郑玄的成果的。

但学者间对郑玄的《左传注》最终是否曾经成书，也有一些不同的议论。清人曾朴说：“《世说·文学篇》称郑君欲注《春

秋》未成，尽以与服虔，为服氏注。则似郑君就此辍业。而《通典》四十七裴子余议引‘定公元年立炀宫，郑玄注：炀公，伯禽之子，季氏禘而立其宫’云云。不知裴氏何所见而云然？岂《左传注》既与服氏，仍自卒业耶？”^①这是因为看到了《通典》中明言“郑玄注”，因而怀疑确有一部郑玄的《左传注》在。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
汉魏之际的学者宋均在所撰《春秋纬演孔图注》中说：“康成注《三礼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，其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则有评论。”^②按宋均是郑玄的亲传弟子，这从他在所撰《诗纬序》中称“我先师北海郑司农”可知；若郑玄真有《左传注》成书，宋均不容不知。而且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等都不见著录，因此郑玄的《左传注》很可能并未成书。至于唐人的经疏如孔颖达《左传疏》、贾公彦《仪礼疏》以及《通典》之类的书里所引郑玄解释《左传》的话，则应如清代学者臧琳所指出，“均非《春秋注》，大抵非《针膏肓》即《郑志》答弟子问也”。^③不过，《通典》中有两条材料，由于明言“郑注”而殊堪注意。一条为《通典·吉礼禘祫下》记宋太常丞朱膺之议，中有“《春秋》闵公二年，吉禘于庄公，郑注云：‘闵公心惧于难’”等语；另一条就是前面提到过的《通典》四十七裴子余议引郑注。今考前一条的材料来源今日尚存，乃是《宋书·礼志》，但原文并不作“郑注云”，而作“郑玄云”，故不能作为郑玄曾注《左传》的证据。这样，这后一条便成了孤证，很难说明什么问题。清代学者袁钧说这是“‘注’、‘志’音近而讹”，裴氏所引其实是“郑志”，^④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。而且既然《宋书》的“郑玄云”在《通典》中可以误抄作“郑注云”，则《通典》四十七所书之“郑注”也未必就完全准确。总之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，郑玄的《左传注》不曾成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

现代学者中也有人主张郑玄最终是完成了一部《左传注》的，例如王利器先生说：

“《仪礼·少牢馈食礼》郑玄注：‘拒读为介距之距。’疏引《左氏传》昭公二十五年云：‘季、郈之鸡斗，季氏介其鸡。’服氏云：‘捋芥子，播其鸡羽。’郑氏云：‘介，甲，为鸡著甲。’又云：‘郈氏为之金距。’注：‘金距，以金踏距。’《仪礼疏》既服、郑并举，而介距之说，《仪礼注》又与《左传注》从同，则康成《左传注》虽与服子慎，仍自卒业，六朝、唐人犹及见之，故得以服、郑并举，或直引郑玄《左传注》也。”⑤

按此说粗看起来甚辩，其实证据有误。考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孔疏云：“郑众云：‘介，甲也，为鸡著甲。’”知《仪礼》贾疏之所谓郑氏，实指郑众而非郑玄。盖郑玄赞同郑众之说，因据其义以改读《仪礼》，本无关乎郑玄之《左传注》的。

郑玄的《左传注》虽然没有完成，但他有关《春秋》研究的著作却有多种。其中最著名的是《针膏肓》、《发墨守》、《起废疾》。

“时任城何休好《公羊》学，遂著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。玄乃发‘墨守’，针‘膏肓’，起‘废疾’。休见而叹曰：‘康成人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’”⑥

按何氏三书，今已不传，但从书名来看，当是墨守《公羊》经义，以攻击《左传》、《谷梁》之非。郑玄则针锋相对，指摘《公羊》的失误，维护《左》、《谷》的经说。何休既有“入室操矛”之叹，可知郑玄对于三家的研究一定都十分的深入，见解一定十分的精辟。三书之外，郑玄还有《六艺论》、《驳五经异义》，里面都涉及了《春秋》的经义。又有《郑志》：“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，依《论语》作《郑志》八篇”。⑦这是郑玄与弟子答问的记录，其中的《春秋志》，是专谈《春秋》问

题的。郑玄的这些著作今日都已亡佚，不过清人做过很好的辑佚工作，依据这些辑本，我们多少还可以略窥郑玄《春秋》学的面貌。

一般认为郑玄的学术是杂糅今古的，因而他的《春秋》学也是兼取《左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三家。在郑玄看来，《春秋》三传各有所长。《谷梁序疏》引《六艺论》云：“《左氏》善于礼，《公羊》善于讖，《谷梁》善于经。”一下子就抓住了三传的特点。所谓“《谷梁》善于经”，大约是指《谷梁》解经较《公羊》为平正，没有那么多“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吧。但是如果说郑玄于三家兼收并采，无所轻轩，恐怕也非的论。事实上郑氏虽然兼通今古文，却是有所宗主的。清儒陈澧曰：“《六艺论》云：‘注《诗》宗毛为主，毛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；如有不同，即下己意，使可识别也。’此郑君注经之法，不独《诗笺》为然。……然则郑君注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尚书》皆与笺《诗》之法无异，有宗主亦有不同，此郑氏家法也。”郑氏的这一“家法”体现在《春秋》学上，则为“郑君宗《左传》而兼用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亦如宗《毛诗》而兼用齐、鲁、韩耳，岂得谓之杂用乎”？^⑧

郑玄之于《春秋》，是偏重于从“史”这个角度着眼的，他说：“《春秋》者，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。左史所记为《春秋》，右史所记为《尚书》。”^⑨这也是古文学派的经典提法。在古文家看来，《春秋》本来是史官的记录，孔子就是根据这些已有的史记，“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”。^⑩就是说根据史实进行褒贬，借用史记中所记载的种种朝聘、会盟、祭祀、田猎的事实来端正周代的礼乐制度。但孔子的这些思想，在当时只是“口授弟子”，并没有形成文字；孔子死后，要想理解、传播孔子的思想，就非了解孔子曾经利用来行褒贬、正礼乐的那些史实不可。这就是古文家尊奉

《左传》的理由。郑玄所谓“左氏善于礼”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《左传》的价值的。而且，郑玄本身就是个礼学家，他当然理解班固所说《春秋》“正礼乐”的功能，因此他以“善于礼”的《左传》为宗主，也就是很自然的了。

郑玄在与何休进行的论战中也时常从历史事实出发，指出《公羊》经说中违反史实的地方，从而加强《左传》的地位。例如《公羊》桓十一年传云：“古者郑国处于留。先郑伯有善于郕公者，通乎夫人以取其国，而迁郑焉，而野留。庄公死，已葬，祭仲将往省于留，涂出于宋，宋人执之。”郑玄《发墨守》云：

“郑始封君曰桓公者，周宣王之母弟，国在宗周畿内，今京兆郑县是也。桓公生武公，迁居东周畿内，国在虢、郕之间，今河南新郑是也。武公生庄公，因其国焉。留乃在陈、宋之东，郑受封至此适三世，安得‘古者郑国处于留’、‘祭仲将往省留’之事乎？”^⑩

何休的意见不知究竟怎样，但既云“墨守”，当是坚持《公羊》的说法。郑玄在这里则指出了《公羊》所述史实之不可靠，以此来动摇人们对《公羊》的信仰。又如《左传》庄六年记载，楚文王伐申时路过邓国，邓国的驺甥、聃甥、养甥三人认为楚文王对邓是个威胁，劝说邓侯杀了他。邓侯不从，后来终于被楚文王灭亡。何休就此事攻击《左传》曰：“楚、邓强弱相悬，若从三甥之言，楚子虽死，邓灭曾不旋踵。若刳腹去疾、炊炭止沸。左氏为短。”^⑪郑玄则抓住他对史事的疏误，进行反击：“楚之强盛从灭邓以后，于时楚未为强，何得云强弱相悬？”同时指出，何休所攻击的，只是《左传》所记当时人的一些议论：“三甥既有此语，左氏因史记之文录其实事，非君子之论，何以非之？”是不应算在左氏的帐上的。^⑫再如《左传》成公十八年记载了晋悼公的种种善政，并说这些是悼公“所以复霸”的原因。何休则以“霸不过五”为由来反对称悼公为“霸”。郑玄反驳说：

“天子衰，诸侯兴，故曰霸。夏有昆吾，商有豕韦、大彭，周有齐桓、晋文，此最强者也。故书传通谓彼五人为五霸耳。但霸是强国为之，天子既衰，诸侯无主，若有强者，即营霸业，其数无定限也。而何休以‘霸不过五’，不许悼公为霸，以乡曲之学足以忿人。传称文、襄为霸，襄承文后，绍继其业，以后渐弱，至悼乃强，故云复霸。”^⑭

这也是从历史事实出发，驳斥何休对《左传》的攻击。

当然，郑玄与何休的争论，在今人看来，有很多是无谓的，属于纯粹经学上的家派之争；要分辨其中的是非，既不可能，也无必要。但上述诸例确实反映了郑玄对《春秋》经传的研究，侧重点时常在史实方面，较少空谈“经义”，表现了古文家求实的精神。

郑玄的《春秋》学，虽然总的来说是以《左传》为宗主，但也兼采今文家的优长，可以说开始打破了家派的藩篱。这是郑玄不同于一般汉代经师的地方，也是他卓越的地方。郑玄对《公羊》经说的采择，散见于他所著《驳五经异义》一书中。《五经异义》本为东汉大儒许慎所著，该书将今文、古文两派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说法分别列出，《公羊》、《左传》的歧异也尽在其中。郑玄的《驳五经异义》则是对这些异说判别优劣是非，表明取舍。此书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为十卷，唐以后亡佚了。清人有辑本，所存恐怕不及原书十分之一。从这个辑本来看，郑玄固然在不少地方依从《左传》，但也吸收了某些在他看来《公羊》义长的东西。例如《五经异义》列举《公》《左》不同云：

“《公羊》说诸侯不纯臣；《左氏》说：诸侯，天子蕃卫，纯臣。”郑玄就赞成今文说：“宾者，敌主人之称；而《礼》：诸侯见天子称之曰宾，不纯臣诸侯之明文矣。”^⑮这是根据周礼判定《公羊》的说法是对的。又如关于“天子是否亲迎”，《五经异义》云：“《春秋公羊》说自天子至庶人娶皆当亲迎；《左

氏》说天子至尊无敌，故无亲迎之礼。”郑玄则根据《诗·大明》的记述，以《公羊》说为是：“太姒之家在洽之阳，在渭之浹，文王亲迎于渭，即天子亲迎明矣。天子虽至尊，其于后犹夫妇也；夫妇判合，礼同一体，所谓无敌，岂施于此哉！”^⑩再如关于周代诸侯的数目，《五经异义》云：“《公羊》说殷三千诸侯，周千八百诸侯；古《春秋左氏传》说‘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’。”郑玄则曰：“诸侯多少，异世不同。万国者，谓唐虞之制也。武王伐纣，三分有二，八百诸侯，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。至周公制礼之后，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，而言周千八百者，举其全数。”^⑪这里显然是吸取了《公羊》的成说，以补《左传》之不足。

除了兼采三传之外，郑玄的《春秋》学也参用讖纬，这一点颇遭后人的訾议。清儒陈澧为之辨诬，引郑玄《戒子书》中“博稽六艺，粗览传记，时睹秘书纬术之奥”数语，然后评论道：“六艺则曰‘博稽’，传记则曰‘粗览’，秘书则曰‘时睹’，三者轻重判然。其注经有取纬书者，取其可信者耳。……郑君注经不信纬说者多矣，后儒疏陋未考耳。”^⑫尽管如此，郑玄习讖纬、用讖纬总是事实，而且他还曾为数部纬书作注，这更为人所熟知。郑玄生活在那样一个讖纬盛行的时代，很难摆脱风气的影响；他又是一个喜综括、善网罗的人，自然会涉足讖纬的领域，这本是无庸讳言的。

清儒皮锡瑞称，“经学至郑君一变”。^⑬的确，郑玄是经学发展历史中一位划时代的人物。他的学术的特点，就在于打破西汉以来经学家法的界限，有所宗主，也有所兼综，改变了汉儒拘墟胶固、抱残守阙的陋习。范晔评论说：“自秦焚六经，圣文埃灭。汉兴，诸儒颇修艺文；及东京，学者亦各名家。而守文之徒，滞固所禀，异端纷纭，互相詭激，遂令经有数家、家有数说，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，学徒劳而少功，后生疑而莫正。郑

玄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删裁繁诬，刊改漏失，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”^{②①}正因为这样，郑玄在当时的威望极高，至有“经神”之号。^{②②}各地的学者不远千里，赢粮而至，生徒多至数千人，可谓盛极一时。不过，郑学盛行的另一面，自然是前此经学家派的消亡。皮锡瑞说：“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，见郑君闳通博大，无所不包，众论翕然归之，不复舍此趋彼。于是郑《易注》行而施、孟、梁丘、京之《易》不行矣，郑《书注》行而欧阳、大小夏侯之《书》不行矣，郑《诗笺》行而鲁、齐、韩之《诗》不行矣，郑《礼注》行而大小戴之《礼》不行矣，郑《论语注》行而齐、鲁《论语》不行矣。”^{②③}至于在《春秋》学方面，郑玄虽然没有一部完整的注行世，但他有关《春秋》研究的论著在当时也极有影响，特别是《针膏肓》、《发墨守》、《起废疾》三书，对本已呈颓势的公羊学派打击甚重。史称郑玄对何休的论战“义据通深，由是古学遂明”^{②④}。此后学者言《春秋》，大多一本郑玄的精神，以《左传》为宗主了。

魏晋时期，郑学继续发生着广泛的影响，郑玄的几部经注仍然被许多人所尊奉。而在《春秋》学方面，被人们普遍看重的则是与郑学颇多共同之处的服虔《左传注》。

注：

①曾朴：《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》。

②《孝经序》邢昺疏。

③臧琳：《经义杂记》卷二十。

④袁钧辑《郑氏佚书·郑志》。

⑤王利器：《郑康成年谱》240页。

⑥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。

⑦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。

⑧陈澧：《东塾读书记》卷十五。

- ⑨ 《公羊序》疏引《六艺论》。
- ⑩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- ⑪ 《周礼·大司徒》疏。
- ⑫ 《左传》庄公六年孔疏。
- ⑬ 《左传》庄公六年孔疏。
- ⑭ 《左传》成公十八年孔疏。
- ⑮ 《诗经·臣工》孔疏。
- ⑯ 《礼记·哀公问》孔疏、《诗经·大明》孔疏。
- ⑰ 《礼记·王制》孔疏。
- ⑱ 陈澧：《东塾读书记》卷十五。
- ⑲ 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（中华书局版）149页。
- ⑳ 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。
- ㉑ 王利器著《郑康成年谱》引《拾遗记》卷六。
- ㉒ 皮锡瑞：《经学历史》（中华书局版）149页。
- ㉓ 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